

江盈科集

卷之二

上冊

黃仁生 輯校

雪齋閣集卷之一

西楚江盈科著

江盈科著

五言古風

高唐道中夜行

去去忽已遠
踉蹌走不休
高唐道中夜行

明發東阿道

去去忽已遠
踉蹌走不休
明發東阿道

西陵道中

去去忽已遠
踉蹌走不休
西陵道中

濕

笑甘脛
耐燃
古道人

志所適

江
盈
科
集
上
册

黄仁生
輯校

岳
麓
書
社

序

一

章培恒

公安派在明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但要對之作進一步的研究，卻還存在不少困難。資料的缺乏就是一個明顯的問題。自然，如果我們到各大圖書館去找，是可以找到的。但是，第一，這類圖書館大抵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這些城市以外的研究者怎麼辦？第二，這些資料一般為明刻本，都屬於善本，借出來是不行的，請求複製則價格嚇人，唯一的辦法是每日到圖書館去看。現在的公共車輛既擁擠，大圖書館一般又不在市中心，即使是年富力壯的人，天天擠很長時間的車去看書，也會疲憊不堪；年老體弱者就只能望洋興嘆了。盡管不怕擠車、刻苦做學問的人並非沒有，但如果不必擠車也可以研究的課題，多數人大概是寧可改換課題的。總而言之，袁宏道及其兄、弟宗道、中道的文集目前雖都有了排印本，但要深入研究公安派，顯然不能光靠三袁文集，而應出版更多的有關資料。在我看來，其中最急需的是江盈科文集。

公安派在明代文壇上之正式形成，是從袁宏道在蘇州做官時開始的；而與袁宏道一起打開局面

的，則是江盈科。鍾惺在《與王穉恭兄弟》中說：

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真有人迹，聞蹙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為輪蹄之所，不止蹙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迹矣。（《隱秀軒文集》往集）

由此可見，在袁宏道開始提出其文學主張時，絕非「登高一呼，應者雲集」，倒是備受冷落。正是在這樣艱苦的時期，江盈科挺身而出，與袁宏道相呼應。二人持基本相同的觀點，創作傾向也大抵相似；而且均處于蘇州，均為縣令（袁為吳縣令，江為長洲縣令），連交往的文人也有不少是共同的。所以，他們在文壇上發生的影響，或者說在擴大公安派影響方面的作用，雖不會相等，也不致懸殊。還是引鍾惺《與王穉恭兄弟》中的文字為證：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暘耳。學袁、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學濟南諸君子也。

鍾惺顯然對江盈科詩沒有好感，此點當于下文再行闡述。但他所說「從此傳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卻正說明了江詩不但在鍾惺寫此信的當時很有影響，而且他以為這種影響在以後還會繼續保持下去，以致「誤人不已」。而且，他強烈反對寫詩「學袁、江二公」，也正反映出在當時（二）的公安派

及其追隨者中，袁、江是基本齊名的學習對象。

我們還可以把江盈科的作用與袁宏道的兄、弟宗道、中道稍作比較。宗道為萬曆十四年會元，「授庶吉士，進編修，卒官右庶子」。「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于唐好白樂天，于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¹⁾。他雖在袁宏道以前就在北京與黃輝一起發表過不滿王世貞、李攀龍的言論，但並沒有像袁宏道那樣地提出「性靈說」——那是公安派（至少是公安派前期）的理論核心，而且，在袁宏道于蘇州提倡「性靈說」以前，袁宗道的主張在文壇上並無影響。在公安派興起以後，雖然「三袁」並稱，但嚴格說來，宗道是叨了弟弟宏道的光。至于袁中道，在袁宏道與江盈科在蘇州張揚「性靈」時，他在文壇上還是初露頭角的新人。他之成為名家，是在公安派已進入後期之時，特別是袁宏道去世以後。所以，在公安派形成之初，與袁宏道一起打開局面，使寂然無人的「空谷」成為「輪蹄之所」的，乃是江盈科。鍾惺在《與王穉恭兄弟》中以「袁、江」並稱，正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所以，要深入研究公安派，絕不能只盯住袁宏道而撇掉江盈科。在文學理論上，袁宏道與江盈科密切配合，相互發明。在創作上，二人都求真求新，反對雕琢模擬。盡管江盈科的詩由于強調「信腕信口」，不注重鍛煉，在一篇中有時會出現「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²⁾的缺點，少數詩甚至寫得像順口溜，如「才子佳人湊作雙，都緣一曲《鳳求凰》。相如不嫁誰堪嫁，始信文君眼力強」⁽³⁾之類，這也難怪鍾惺要斥為「惡道」了；然而通篇都符合或接近袁宏道所說「窮新極變，物

無通情」的，卻也不乏其例。如《春日即事》：

溪水澄澄溪柳斜，燒痕搖綠遍天涯。暖風迫燕爭營壘，晴日蒸蜂亂散衙。艷女踏芳雲作隊，蕩兒行樂酒爲家。南衙北陌聲如沸，都向青樓喚賣花。

前四句寫自然界的春色，後四句寫蘇州這一繁華城市在春天的特定景象，均生動貼切；說燕子的「爭營壘」是爲暖風所迫，蜜蜂的「亂散衙」是受晴日之蒸，均設想奇特而可喜；至于「酒爲家」一語，則是說無論茶寮酒家、青樓郊野，只要有酒之處，皆留連忘返，既寫出了蕩子的縱酒，也暗示了行樂之地的繁多，在精煉的語句中包含了豐富的内容；且通篇自然清新，洵是佳作。可見江盈科在詩歌創作上也確有不應漠視的成就。總之，如對江盈科的集子進行深入的研究，我們就有可能對公安派的理論和創作——包括其長處和弱點——獲得進一步的理解。

但是，倘要研究者自己到圖書館去找齊江盈科的作品，那就要費去很多時間、精力和金錢，我實在不知道有幾個人能夠做到。現在黃仁生副教授經過艱苦的尋索，把存世的江盈科作品加以匯集，並作了認真的校點，由岳麓書社出版，這對於晚明文學——特別是公安派——的研究實在是很有益的事。我衷心希望今後能多一些這樣的書籍出版，爲研究者帶來更多的方便。

注釋

〔一〕此信稱袁宏道爲「袁儀部」，據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郎先生行狀》，袁宏道做「儀部」的官是從萬曆

二十八年庚子（一六〇〇）開始的，至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調吏部，故鍾惺此信當寫于萬曆二十八年至三十五年之間。但信中又稱江盈科爲「江令」，盈科于萬曆二十六年自長洲令離任，此年冬天在真州度歲，開年後曾返鄉一行，初夏尚在故園，至早于二十七年夏天抵達京城任大理寺正。鍾惺信既稱盈科爲「江令」，自應在盈科任長洲令時；但也可能在盈科任大理寺正之初，鍾惺不知其已經調官，故仍稱「江令」。再參照信中「袁儀部」語，此信以寫于萬曆二十八年或二十九年的可能性爲大；因越往後推，則鍾惺不知道江盈科已不任縣令的可能性越小。

〔二〕《明史·袁宗道傳》。

〔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

〔四〕《卓文君》，見于《雪濤閣集》卷五。

序 二

陳蒲清

黃仁生博士點校的《江盈科集》，在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幫助下，由岳麓書社出版問世，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此書出版為研究晚明文學思潮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提供了一份寶貴而完整的資料，對兩湖文化研究也具有獨特價值。

明代後期，皇權衰微，政局動盪，而專制主義的文化政策也隨之破產，於是迎來了一個思想解放和文學繁榮的時代。在文學上，白話小說和戲曲創作全面豐收，寓言和笑話創作也空前繁榮，俗文學領域名家傑作輩出，標志着中國文學的一次巨大變革；傳統詩文創作，也不斷突破樊籬，後浪超越前浪，出現了流派紛呈並不斷向俗文學靠近的可喜局面。

袁宏道、江盈科為代表的「公安派」，在晚明文學大潮中扮演了重要的弄潮兒角色。他們反對理學束縛，抨擊復古剽竊，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求真重趣，尚奇崇變，文風活潑，形式通俗，代表了重個性、求解放的進步傾向。但是，古老中國的正統思想與正統詩文具有根深蒂固的力量，袁江

等人遭致了來自不同方面的壓力與攻擊。如：竟陵派領袖人物，打着矯正公安派流弊的旗號，極力攻擊「袁江二公」的俚俗淺率，主張從古人詩詞中尋求「幽深孤峭」的意境，雖不是沒有正確之處，但從整體來看本質上是一種倒退。清皇朝組織編修《四庫全書》，更把晚明的進步文學潮流視爲異端。在《四庫全書》中，除把江盈科編寫的《明十六種小傳》存目之外，對袁江等人的詩文不收片言隻字。這種影響所及，近世出版的頗有影響的《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初編》等叢書，都沒有收編袁江等人的著作。他們被歷史冷落了三百多年。然而，歷史終究是公正的。文學史家終於逐步發現了晚明文學的光輝和價值，發現了公安派的價值，在本世紀三十年代還曾掀起了一股「袁中郎熱」。不過，迄今爲止，不少人往往忽視了袁宏道的親密戰友——江盈科。這正說明，人們的歷史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

江盈科（1553—1605），字進之，明湖廣桃源縣人。名字和爲人，本無甚麼必然聯繫。但是，江氏的名字似乎象征了他的生平。孟子贊美水說：「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江盈科這位農家子弟，才秀人微，歷盡坎坷，直到萬曆二十年（1592）才考中進士，走向全國政壇和文壇。他治理長洲，恤刑黔滇，提學四川，皆能體察下情，興利除弊，是一位難得的好官；他跟袁宏道一起創立公安派，影響及于全國和後世，更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他就像是從深山中流出的一道涓涓小溪，歷經曲折險阻，不舍晝夜地前進，終於匯成了晚明文學創作的波瀾壯闊的長江大海。

江盈科對公安派的貢獻巨大，有三個方面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公安派的創立，公安派文學理論的完善，公安派創作領域的拓展，這三個方面都有江氏的獨特貢獻。公安派起于吳中地區，鼎盛于北京，影響到全國，其核心人物便是袁宏道與江盈科。袁宏道《雪濤閣集序》明確追述說：「余與進之游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勸，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袁中道《江進之傳》也說：「予伯兄、仲兄及予，皆居京師，與一時名人于崇國寺葡萄林內，結社論學，公與焉。」

江盈科在詩文理論上與袁宏道是相互呼應的。江的《雪濤閣集》由袁作序，這篇序與《叙小修詩》等是袁宏道詩文理論的代表作。袁宏道的《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等，由江作序，這些序與《白蘇齋冊子引》等是江氏詩文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江氏還有《雪濤詩評》這樣能自成體系的詩論著作，闡發「用今」、「求真」、「詩文才別」等重要主張；還有《閩秀詩評》這樣為婦女文學張目的著作，這都是袁宏道所沒有的。《雪濤詩評·數奇》講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明太祖朱元璋，因人作詩吹捧，便給以高官厚祿；有人因吹捧的詩句觸犯了他的猜忌狂，便無端被砍頭。江盈科最後寫道：「太祖評詩，可謂無定價矣！」這是直斥明朝開國皇帝，在那種時代該具有何種的識力與膽氣啊！而且它接觸到了文藝創作的一個根本問題，反對文字獄，反對政治暴力對詩文的無理干涉。

袁宏道最有價值的作品是其描摹山水、抒發性靈的小品文。在這方面，江盈科的確趕不上袁宏

道。這大概因爲，江氏早年生計艱難，中進士後吏事旁午，似乎太缺少優游山水的條件；這方面的才氣也趕不上袁中郎。但是，江氏有兩點超過袁氏兄弟。第一，袁氏小品直抒性靈，個性突出，但涉及國計民生者較少；江氏詩文中則大多爲關心國計民生之作，發論精警，具有大家風範。如：他的時論，主張抗倭、變法、理財，提出要善于用人。《用人》篇提出要善于使用和駕馭小人，《邊材》提出「品無兼局」，不同職位要用不同品位的人才，皆新穎大膽，切中時弊。他的史論，則見解新穎，毫無道學氣。《秦始皇》謂始皇「無聖人之德而其才則聖人之才也」，《漢武帝》提出「宋祚之弱，弱于君子講理學，小人肆奸謀，而爲執政者不留心于因材器使之道」，皆具有不同流俗的歷史眼光。他的很多文章成組出現，結構宏偉，論證周密，如天風海雨，驚神駭目。第二，袁氏雖推崇通俗文學，但無創作實踐；江氏則力求理論與創作結合，在寓言和笑話創作上成績突出。江盈科《笑林引》說：

蘇代以土偶止田文之行，淳于以豚蹄加齊宣之璧，曼倩以鹿觸之言悟漢武之殺卒，優伶以廡室之說止二世之漆城。此豈非諧語之收功，反出于正言格論之上者哉！……若夫索河源于昆侖，不可謂非尼老（按：指孔子）作俑。

可見他自覺地認識到了寓言和笑話的作用，並進而指導自己進行創作。《雪濤閣集》卷十四「小說類」，五十二篇故事大都是寓言和笑話。《諧史》一百四十七則，全部是笑話和寓言。《談叢》十一則，《談言》十一則，也是如此。在其他散文中也往往穿插寓言說理。因此，江氏在古代寓言和笑話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上兩點，都是江氏開拓了公安派的創作領域。江氏詩文大都具有新意，文尤突出。以上僅是最突出的兩點而已。

《袁中郎集》早有人整理重印。《雪濤閣集》在全國幾乎已成孤本。黃仁生博士，精心校勘《雪濤閣集》；又從多種地方志中搜羅爬剔，得詩文一百餘篇；後來又發現了孤本僅存的《皇明十六種小傳》加以點校；再益以傳世較廣的《雪濤談叢》、《談言》、《諧史》、《雪濤詩評》、《閩秀詩評》，以及關於江盈科的傳記、序跋，匯成了這部《江盈科集》。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江盈科的最完整的文集，是研究晚明文學思潮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資料。

人傑地靈，傑出的人物和優美的山川風物，往往是鄉土的驕傲。離桃花源不遠的地方，明代出了江盈科，近代出了傑出民主革命家宋教仁，他們都是桃源人的驕傲。江氏一直眷戀故鄉的山水，因故里有著名景點「淥蘿晴畫」、「白馬雪濤」，故自號「淥蘿山人」，又以「雪濤」兩字作為自己詩文集的名稱。我和黃仁生博士都是江盈科的同鄉。當十多年前我寫《中國古代寓言史》初稿發現江盈科之後，一直有整理江氏全集之志，但力不從心。仁生同志努力完成這一工作，正寄托了對故鄉的熱愛之情，又為研究湖湘文化乃至兩湖文化（明時公安與桃源皆屬湖廣布政司管轄）提供了一份獨具價值的資料。

總之，岳麓書社出版《江盈科集》，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江闕無澄浪 林深有墜枝

——論江盈科與公安派（代前言）

黃仁生

引 論

關於公安派在晚明文學革新運動中的功績和意義，學術界已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但論者往往都以三袁作為公安派的領袖，而對曾為公安派的創立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江盈科却少有論及，甚或因襲古人成見，視其為公安末流而被以惡名。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江盈科的詩文集《雪濤閣集》自萬曆二十八年刊行以後，從未有人翻刻過，人們因難以讀到《雪濤閣集》而不知其真實面目。二是竟陵派鍾惺《與王穉恭兄弟》一文對江盈科的貶責流播甚廣，而後人又多以耳代目，於是信以為真，人云亦云。其文曰：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暉耳。學袁、

江二公，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學濟南諸君子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鉸，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于此尤當緊着眼。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即今之偏廢；今之獨響，即後之同聲。此中機揆，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真有人迹，聞蹙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已漸為輪蹄之所，不止蹙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迹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觀場。（《隱秀軒集》卷二十八）

很明顯，這實際上是一篇討伐公安派的檄文，旨在為竟陵開宗立派而張目。但我們從反對派的批評中，却可以獲得一個可靠的信息，即當時文壇以「袁、江二公」並稱。筆者本文的寫作也由此受到啓迪，試圖通過考察江盈科參與創立公安派的過程及其文學思想與創作，能夠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公安派的認識。

一、江盈科參與創立公安派的過程

江盈科（1553—1605），字進之，號涑蘿。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出生于桃源縣沅江邊上距桃花源不遠的一個農民家庭，與公安三袁同屬湖廣人，都是在楚風的薰陶下長大的。但他一生數奇，早年數困場屋，直到萬曆二十年四十歲時，才與比他小十五歲的袁宏道（1568—1610）同榜進士及第；

而比他小七歲的袁宗道（1560—1600），却早在六年前就以會試第一、殿試二甲第一，授庶吉士，入翰林院授編修，位居清華之職；唯有比他小十七歲的袁中道（1570—1623）後來坎壈過之，直至萬曆四十四年，中道四十六歲時才中進士。

眾所周知，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主將，而江盈科始終只是一個配角而已；但在一個文學革新派的形成過程中，其主要配角的作用與意義也不可低估。為便于行文，試依據現存文獻資料，將公安派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分為四個時期來加以考察。

（一）醞釀準備時期（萬曆十八年至二十二年）

其時張居正變法失敗不久，明朝政治已陷入內憂外患的深重危機之中：東南時刻面臨着日本海盜的侵擾，西南有播州宣慰使楊應龍于十八年叛亂；北方有寧夏致仕副總兵哱拜于二十年三月叛亂，總兵官李如松統兵剿之，至九月始平；同年五月倭犯朝鮮，陷王京，朝鮮王求救，七月明師援朝，敗績于平壤，十月再出師援朝。由于軍費激增，統治者不斷增加賦稅，強行搜刮江南錢糧，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尤其「三吳賦稅之重，甲于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謝肇淛《五雜俎》卷三）江盈科與袁宏道雖于壬辰幸得一第，但實際上仕非其時。隨後江盈科授長洲令，又選非其地。因為長洲與吳縣這兩個屬於蘇州府治的鄰縣，素有「東南最巖邑」之稱，極為難治，而其中最為棘手的還是征稅，僅長洲一縣，國稅近五十萬，當「滇南一藩省」。盡管江盈科上任後日夜「黽勉從事」，廢寢忘餐，但不久即「以歲課不登見奪餼」，于是用世之心日冷，歸隱

之志漸生，但因「家無負郭，未免藉五斗供堂上人體粥」（《答顧靖甫》），只好「強自排遣，托于吏隱」（《與謝在杭》）。他于萬曆二十一年在官署中建小漆園，並作《小漆園記》一文和《小漆園即事》一詩，這表明其吏隱心態已經形成。從此以後，他一方面不再計較政治得失，「要之盡吾心行吾事」而已；一方面開始更多地寄情于名山事業，認為「極吾才情，成一家言，亦足千古」（卷十二《答謝九紫》）。實際已為即將興起的文學革新運動做好了心理準備。而袁宏道似乎早有先見之明，及第後尚未授官，就與兄宗道上書告假回公安，在家砥礪「美劍」，待時而出。

當時文壇雖然仍為擬古雲霧所籠罩，黃茅白葦，彌望皆是；但後七子領袖李攀龍早在隆慶四年就已隕落，王世貞也于萬曆十八年逝世；于是復古派陣營內部開始發生分化，或出而修正末流弊端，或試圖改弦易轍，而徐渭、李贄、湯顯祖等人則已開始明確批判復古派的模擬之風。袁宏道兄弟此前雖曾結文社于城南，「于舉業外為聲歌古文詞」，但尚未形成文學革新主張，自萬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間三度訪晤李贄並得讀其《焚書》以後，宏道「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為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如象截激流，雷開蟄戶，浸浸乎其未有涯也」。《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狀〉》于是他在二十二年作《答李子翬》詩，首次明確對當時「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的詩風深致嫉惡，至謂「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實為後來情真論、性靈說之濫觴。又袁宗道《白蘇齋類集》有《論文》上下篇，對王、李復古模擬謬論進行了有力抨擊，當

也是在訪晤李贊受到啓示之後所作，論者多揭舉此文以宗道爲宏道之先驅，不過是因宗道年長官尊而想當然推測得來，實際上宗道在文學識見和創作上皆遠不及中郎，據中道《書方平弟藏慎軒居士卷末》說：「伯修詩穩而清，慎軒（黃輝號）詩奇而藻，兩人皆爲中郎所轉，稍稍失其故步。」倒是可以見出，宗道實際受過中郎的影響。

與三袁相比，江盈科不曾訪晤李贊，實爲憾事，但他早年爲諸生時，庠師文蓮山先生的文學觀却曾使他受益非淺，以致多年之後還爛熟于心。蓮山先生「評駮文藝，以清虛解脫爲宗，盡澆剽剝之陋」。嘗曰：「摘文必根諸心，不根諸心，文雖工，雕蟲耳。」因而主張「因心爲文」。（《蓮山文師去思碑記》）這種「因心爲文」、「盡澆剽剝之陋」的觀點，實與他後來主張抒寫性靈，反對模擬剽竊的思想相通。入仕前，曾與同里友人結社于桃花源，「名己隆隆起」。仕長洲令不久，他又與當地和過往的一些著名文人如王百穀、張鳳翼、張獻翼、屠隆、謝肇淛、潘之恒等詩酒唱和，初步形成了一種吳楚文風交融互補的氛圍。

（二）開宗立派時期（萬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其時內憂外患的危機加劇，歷時七年的援朝抗倭戰爭至二十六年底方結束，歷時十一年的西南播州楊應龍叛亂至二十八年六月才平定。神宗爲解決財政危機，自二十四年七月起，陸續派宦官到各地充礦使稅使，直接搜刮民財，騷擾地方，不斷激起民變，導致朝野皆怨。然而，「國家不幸詩家幸」，醞釀準備了數年的公安派終於在此時登上壇坫，袁、江二公大旗一揮，復古派末流紛紛倒戈，